

## 降清明臣與清初輿論\*\*

陳 永 明\*

### 摘 要

自從乾隆皇帝編修《貳臣傳》以貶斥降清明臣後，史家論及清初貳臣，多認為他們「大節有虧」，備受當世所譴責。然而，考諸史實，明、清之際不單是一個舊政權解體而新政權尚未取得統一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官方意識形態暫時失卻了主導地位的時期。明末弊政引發了人們對「愚忠」的質疑；重建社會秩序和延續華夏文化等迫切需要，也促使時人於議事論人時，每多著重事功和社會實效，反而較少空談道德原則。因此，那些在改善民生、恢復社會秩序，以及維護華夏文化於不墜等幾方面有實績的清初明降臣，輿論對他們亦普遍採取了較為寬容的態度，並肯定他們在局勢紛亂的艱難環境下所作出的貢獻。

關鍵詞：遺民、貳臣、明末、清初、錢謙益、吳偉業

### 一、引 言

明朝（1368-1644）中後期的政治腐敗和經濟破產，直接激起了崇禎年間（1628-1644）席捲全國的地方民變。最後，其中一支由陝西民變領袖闖王李自成（1606-1645?）所領導的民變隊伍勢如破竹，在短短的三個多月時間，

---

收稿日期：2008年10月7日，通過刊登日期：2009年10月21日。

\* 作者係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博士後研究員兼名譽助理教授。

\*\* 本文初稿承蒙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何冠彪老師指正，並提出了若干增補建議，謹此致謝。

由西安直迫北京，並於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攻陷京城，<sup>1</sup>結束了朱明帝國二百七十六年的一統天下。接踵而來的是吳三桂（1612-1678）引領清兵入關，滿洲人取代李自成入主北京，並與南方由明室舊臣先後擁立的幾個南明（1644-1662）小朝廷，展開了長達十八年的統一戰爭。<sup>2</sup>

這段明、清（1644-1912）交替，「星移物換」的歷史，不但為漢族士人帶來了一次嚴重的身分認同危機，而且亦使他們深深感覺到，有必要認真反省自身在改朝換代時所肩負的道德責任。明末大儒劉宗周（1578-1645）師生對「食人之食者」，在面對亡國時應否自殺殉國的討論，便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據劉氏後人的記載，劉宗周在乙酉（1645）決定絕食殉國，他的學生卻欲加以勸阻。其間的討論，充分反映了他們師徒對自己作為士人，在易代之際應如何自處的不同看法。<sup>3</sup>這方面的反思，亦可以散見於清初明遺民在易代之後，對出處問題的討論之中。<sup>4</sup>明末清初士人所面對的道德困局，其實與宋明理學影響下的倫理道德觀念，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近人大多同意，中國歷史上忠於君主的「忠君」觀念起源於春秋戰國（前770-前221），經孔（丘，前551-前479）、孟（軻，前372-前289）而成了儒家學說的其中一個重要課題。然而，先秦儒家所強調的這種君臣關係是

---

1 談遷（1594-1658），《國榷》（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第6冊，卷100〈思宗崇禎十七年〉，頁6047。

2 對於應以何年作為南明結束的年分，歷來中、外學者有多種不同的看法。本文採用了美國學者司徒琳（Lynn Struve）的界說。參看 Struve, *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2; Struve, "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 in Denis Twitchett (1925-2006) and 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7,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641-725.

3 有關記載，參見劉汭（1614-1664），《戡山劉子年譜》（收入劉宗周，《劉宗周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第6冊，附錄2，頁166-172）；劉士林（1641-？），〈戡山先生行實〉（收入《劉宗周全集》第6冊，附錄4，頁600-605）。劉汭生年，陳乃乾（1896-1971）作1613年（《清代碑傳文通檢》，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312），誤。《戡山劉子年譜》於萬曆四十一年（1614）有「六月舉不孝子汭」語（《劉宗周全集》第6冊，附錄2，頁68），故知劉汭生年應為1614年。

4 參看何冠彪，〈論明遺民之出處〉，氏著，《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頁53-124。

相對的，即「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sup>5</sup>「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sup>6</sup>把臣子對君上忠誠絕對化的言論，是秦（前221-前206）以後才發展起來的。<sup>7</sup>惟到了宋代（960-1279），以儒家「三綱」為基礎，強調臣子必須絕對忠於君主的政治思想，已發展至幾乎壟斷了漢族士子之間，對君臣關係的討論。<sup>8</sup>加以統治者不斷以此作為教化，這種思想遂得以深入人心，及至明代，更成了朝野內外的主導意識形態。<sup>9</sup>儘管在晚明時期，士人在論政時，曾出現過不少批判專制皇權，指斥其導致朝政混亂的言論，<sup>10</sup>但作為儒家道德主要元素的「忠君」思想，仍然是大一統政權下，一般人用來衡量人臣操守的

- 
- 5 阮元（1764-1849）校刻，《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下冊，卷3〈八佾篇第三〉，頁2468。
  - 6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下冊，卷8上〈離婁章句下〉，頁2726。
  - 7 參見寧可、蔣福亞，〈中國歷史上的皇權和忠君觀念〉，《歷史研究》1994.2(1994.4): 79-95；魏良弢，〈忠節的歷史考察：先秦時期〉，《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1994.1(1994.2): 110-120；魏良弢，〈忠節的歷史考察：秦漢至五代時期〉，《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1995.2(1995.5): 119-130；張錫勤、柴文華主編，《中國倫理道德變遷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上卷，頁93-100、137-144、211-217、294-302。
  - 8 Wang Gung-wu, "Feng Tao: An Essay on Confucian Loyalty," in Arthur F. Wright, ed., *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188-210; Richard Davis, *Wind Against the Mountain: The Crisis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6), pp. 5-25; 張錫勤、柴文華主編，《中國倫理道德變遷史稿》下卷，頁53-58。
  - 9 安部健夫，《清代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71），頁48-51。
  - 10 《萬曆邸鈔》（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1），第3冊，卷6「萬曆四十五年十月」，頁2383-2388；《萬曆起居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第9冊，「萬曆三十六年七月」，頁86-102、947-950。並參見William de Bary, "Chinese Despotism and the Confucian Ideal: A Seventeenth-Century View," in John K. Fairbank (1907-1991),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pp. 163-203; 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0），頁262-282；蕭公權（1897-1981），《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1980），下冊，頁604-639；郭厚安，〈論明清之際對君主專制的批判〉，《西北師大學報》32.5(1995.9): 1-8；馮天瑜、謝貴安，《解構專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頁135-231。

主要標準和依據。

麥穆倫 (Ian McMorran) 曾對此作過細緻的分析。他認為中國傳統的忠君觀念可以分成「絕對忠君」及「理性忠君」兩大類——前者強調忠君是無條件的，而後者則主張忠君必須建基於合乎政道的條件之上。他同時指出，在專制政府的長期教化政策下，即使明末的弊政不斷受到士人的批評，但「絕對忠君」在十七世紀仍是人們普遍接受的道德價值。<sup>11</sup> 麥穆倫的論點，亦可以在晚明的「東林運動」中得到間接的印證。是時，東林領袖即使激烈批評朝政，但仍多把造成政治腐敗的責任，歸咎於弄權的宦官而非昏庸的皇帝，再者，他們也準備隨時以身殉君。<sup>12</sup> 然而，在北京失陷後，改朝換代的殘酷現實，卻對這個向為傳統讀書人視作金科玉律的道德教條，提出了最嚴峻的挑戰。

## 二、政治現實對道德理念的挑戰

在朱明北京首都落入變民之手，政治社會秩序面臨全面解體的危急情況下，儒家理學所倡導的忠君思想，已不再單單是理念上的思辨，而更是實際生活上，信徒能否躬行實踐這種道德信念的現實問題。身處在南明政權永無休止的黨爭和內鬥，<sup>13</sup> 以及清兵南下節節勝利，步步進迫的惡劣環境中，<sup>14</sup> 士人此時於抉擇上最大的困惑，莫過於須在「忠君」和「愛民」的兩難中作出取捨：他們應該不惜任何代價，恪守儒家的忠君教條，與危如累卵的南明

---

11 見麥穆倫 (Ian McMorran) 著，程薇譯，〈明清鼎革之際忠君考〉，載龍巴爾 (Denys Lombard) 及李學勤編，《法國漢學》第 1 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6），頁 46-56。

12 劉澤華主編，《中國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頁 597-598。

13 明代黨爭始於萬曆（1573-1620），並延續至整個南明時期。參看謝國楨（1901-1982），《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81-95；小野和子，《明季黨社考：東林黨と復社》（東京：同朋社，1996），頁 523-573。

14 清人於 1644 年 8 月 9 日（順治元年七月九日）正式宣布定都北京（巴泰（？-1690）等，《世祖章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6「順治元年甲申七月癸巳」條，頁 66），復於 1645 年 6 月 8 日（順治二年五月十五日）攻陷南京（巴泰等，《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17「順治二年乙酉五月己酉」條，頁 148），整個過程只費時十個月。

政權共存亡，<sup>15</sup>還是順應時勢，與清人合作，盡早結束眼前的混亂局面，以免有更多無辜的百姓為此而生靈塗炭？要在兩者之間作出抉擇，固然令人感到十分困難和痛苦，而不論決定為何，作為四民之首，自命肩負著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等道德使命和社會責任的士人，亦有必要為自己的行為提供一個使人信服的理據。無可否認，在「忠君」的前提下，盡忠似乎是士人的首要責任，但誠如余英時在討論宋代的政治文化時指出，理學的政治思想，乃將「治統」的合法性（legitimacy）依附於「道統」之上。<sup>16</sup>綜觀這種重視道統的理學傳統精神，對明末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故即如黃宗羲（1610-1695）和顧炎武（1613-1682）等備受當世尊崇的明遺民，在遭逢巨變、痛定思痛之後，亦相繼提出了諸如「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sup>17</sup>「有亡國，有亡天下」<sup>18</sup>等超越一姓之忠的激進政治主張。以南明的腐敗政治情況而言，其治統之合法性自不免令人產生懷疑，由是可以想像，在當時一般士人的心目中，「盡忠」與「愛民」之間的矛盾，亦必然因此而顯得更為緊張。

固然，在崇尚氣節的傳統社會裏，「失節」行為——不論出於何種原因，都是個人操守上的污點。自從乾隆皇帝（愛新覺羅·弘曆，1711-1799，1735-1796在位）於1777年下令編修《貳臣傳》以貶斥降清明臣後，<sup>19</sup>這種行為更普遍受到社會的強烈譴責。<sup>20</sup>不過，在政局動盪以致意識形態控制

---

15 汪榮祖在分析南明抗清這段歷史時指出，自南京失守後，「江南抵抗清軍入侵，已群龍無首，只有個別的所謂『義師』，實際上是烏合之眾的自殺性反抗。」見氏著，〈江南與明亡清興——兼論歷史地緣說〉，載熊月之、熊秉真編，《明清以來江南社會與文化論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頁11。

16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03），上篇，頁45；並參考氏著，〈道統與政統之間——中國知識分子的原始型態〉，載《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77-99。

17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臣〉，載吳光編，《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1冊，頁4。

18 顧炎武，《原抄本日知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卷17〈正始〉，頁379。

1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第8冊，頁479-480，編號1224條；慶桂（1735-1816）等，《高宗純皇帝實錄》（《清實錄》第2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1022「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十二月庚子」條，頁693。

20 《貳臣傳》否定「失節」者的道德觀點，其影響是頗為深遠的。即使帝制中國現已成為過去，但不少人在談論到清初的貳臣時，還傾向把這批歷史人物視為無恥之徒，甚至將他們

失效的現實環境中，當事人對這個複雜問題的看法，卻未必如後人在事過境遷後所想像的一樣。畢竟亂世和治世，輿論對同一社會行為的解讀，往往存在相當大的差異，這種現象，無疑是歷史研究中，一個頗為值得注意的有趣課題。

### 三、明朝漢官降清實況

面對明、清易代之際，降清明室官員數目龐大，以及不少地方領袖均對滿洲新政權採取了妥協的態度等種種史實，近年研究這段歷史的史學家已逐漸注意到，是時大部分士人的政治抉擇，實際上與主導意識形態所強調的「絕對忠君」教條，是存在著相當明顯的差距的。<sup>21</sup>若根據官方奉行的程朱理學來說，臣子對君主的絕對忠誠，乃「天理」的體現，也是「三綱五常」等維繫社會秩序的人倫規範中，至為重要的一項原則，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士人仍須嚴格遵守。<sup>22</sup>然而，諷刺的是，當李自成攻陷北京，迫使明朝皇帝朱由檢（1611-1644，1627-1644在位）在煤山自殺身亡時，文臣追隨君主殉國

---

等同於近代民族主義者所貶斥的漢奸。有關例子，參考：李文，〈文人風骨〉，《文學自由談》2000.4(2000.8): 4-11；〈文人的節操〉，《文學自由談》2007.2(2007.4): 4-13；李秉鑒，〈刺貳臣詩摭談〉，《閱讀與寫作》2006.10(2006.10): 29-30。

- 21 Hilary J. Beattie, "The Alternative to Resistance: The Case of T'ung-ch'eng, Anhwei," in Jonathan D. Spence and John E. Wills, Jr., eds.,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239-276; Frederic Wakeman (1937-2006),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267-290, 415-447, 640-646; Wakeman, "Localism and Loyalism during the Ch'ing Conquest of Kiangnan: The Tragedy of Chiang-yin," in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 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p. 43-85; Ho Koon-piu, "Should We Die as Martyrs to the Ming Cause?—Scholar-officials' Views on Martyrdom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Oriens Extremus* 37.2 (1994): 123-151; 以及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頁19-21。

- 22 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1冊，卷2上〈遺書〉，頁43；朱熹（1130-1200），《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叢刊》（電子版）初編集部，北京：書同文數字化技術公司，2001），卷82〈跋宋君忠嘉集〉，頁9b；朱熹著，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2冊，卷24，頁599-600。



難者只有二十餘人，<sup>23</sup>相反在數天之後，百官囚服午門外迎降者，人數竟高達四千多人。<sup>24</sup>及至清兵入關，打敗了李自成後遷都北京，並逐步展開了掃蕩長江以南明室幾個小朝廷的計畫時，大部分地方精英也選擇了與清人合作，欲藉此穩定地方的局面，而只有少部分人決意繼續拼死抵抗。據1643年來華之意大利耶穌會士衛匡國（Martin Martini, 1614-1661）的觀察，在清兵南下的初期，他們並未遭遇到漢人的太大抵抗，而一直要到清政府發出了導致群情洶湧的薙髮令之後，社會上由縉紳所組織和領導的抵抗運動才轉趨激烈。<sup>25</sup>衛氏的敘述似非出於個人的臆測，因為同時期朝鮮李朝（1392-1910）的記載，亦間接證實了這一點。<sup>26</sup>也許，對於那些不視薙髮易服為中原文化淪於左衽的人來說，清人應是此時各個政治勢力中，較有希望迅速重建社會秩序的力量。孫奇逢（1585-1675）的個案可以作為一個參考的例子。孫氏在甲申京城城陷後，一再堅拒李自成的招降，但當清兵打敗李自成攻入北京後，他卻很快便薙髮易服，屈從新朝。<sup>27</sup>

清初史家萬斯同（1638-1702）在討論晚明歷史時，曾對士風作過這樣的

23 計六奇（？-1622）記殉國文臣有二十一人，並開列了他們的名單，見氏著，《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下冊，卷21上〈殉難文臣〉，頁502-548；據談遷所記，文臣殉國者有二十五人，人名亦與計氏所記略異，見氏著，《國權》第6冊，卷100〈思宗崇禎十七年〉，頁6048。

24 明臣迎降人數的記載，參看計六奇，《明季北略》，卷20〈諸臣投職名〉，頁472；〈廿三辛亥諸臣點名〉，頁473-475；〈三月廿六勸進本末〉，頁481-482；〈選陞降臣〉，頁482；卷22〈從逆諸臣〉，頁598-641。另參《多爾袞攝政日記》（北平：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1933），〈〔順治二年〕閏六月十四日〉，頁9a；吳晗（1909-1969）編，《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80），上編，卷58〈仁祖大王實錄七·二十二年（明崇禎十七年）〉，「甲申八月戊寅」至「甲申十月甲子」條，第9冊，頁3733-3737。由於當時局勢混亂，交通隔阻，北京陷落的信息，在地方上便有不少訛誤傳聞。有關情況，參見岸本美緒，《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17世紀中国の秩序問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9），第五章〈崇禎十七年の江南社会と北京情報〉，頁143-195。

25 Martin Martini, *Bellum Tartaricum, or the Conquest of the Great and Most Renowned Empire of China* (London: John Crook, 1654), p. 127.

26 朝鮮方面的記載亦謂：「〔清兵〕入關之初，嚴禁殺掠，故中原人士無不悅服。及有剃頭之舉，民皆憤怒。」參看吳晗，《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58〈仁祖大王實錄七·二十二年（明崇禎十七年）〉，「甲申八月戊寅」條，第9冊，頁3734。

27 張曉虎，〈孫奇逢〉，載王思治主編，《清代人物傳稿》上編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176-177。

分析和批評：

士風之變易也，豈不易哉？方弘治（1488-1506）之世，人人自愛而尚名節，重廉恥，豈不誠忠厚之俗耶！及劉瑾（？-1510）一出，向時之大僚遂蒙面濡首，爭先屈膝而不恤，而高銓（1443-1511）之子至自劾其父。衣冠變為異類，何其甚哉！乃知若輩之在先朝，非果能自立也，幸士習方隆，故不至敗露耳；一旦隄防既壞，遂放溢決蕩而不可收拾矣。然則中材之士，處盛朝而保其名行，遇濁世而決其防檢者，何可勝數？彼固有幸有不幸哉！<sup>28</sup>

趨炎附勢的事例，在歷史上屢見不鮮，而把士人的政治取向看成是道德問題，固有一定的道理。不過，若單單只從這個角度來分析他們的社會行為，又似乎無法解釋，何以在易代期間，地方的抗清態度，要到清政府頒布了薙髮令之後，才出現如此急劇的轉變？比較合理的推論是，這種現象正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漢人對本族文化的認同，要遠比對在垂死中掙扎之明政府的政治認同為高。<sup>29</sup>對於大部分經歷過此次改朝換代變亂的人來說，十七世紀中葉無疑是個「天崩地裂」的時代。<sup>30</sup>在民變四起和戰亂頻仍的嚴峻形勢下，明政府此時的威信已是江河日下。長時間的亂局不但摧毀了舊有的政治和社會秩序，而且也動搖了大眾對朱明政權乃天命所歸的信仰。中國自古便流行以「天命」來解釋政權的興廢，而統治者亦會借「天命」以說明其政權的合法性。明自太祖朱元璋（1328-1398，1368-1398在位）開始，詔書首語必言

28 萬斯同，《石園文集》，見《四明叢書》（臺北：國防研究院、中華大典編印會，1966），第4集第4冊，卷5〈讀高銓傳〉，頁3b-4a。

29 Jean-Marc Coicaud 在分析「合法性」(legitimacy) 與現實政治的關係時指出，統治者的合法統治權並不是沒有條件限制的，它乃建基於社會的普遍認同之上，而這種認同之存在與否，又取決於統治者是否有能力維持社會的秩序和保障社群的福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權責是相對的，而統治者只有在其表現合乎社會的期望時，其合法地位才會得到認可，相反便會受到質疑，嚴重者甚至會喪失其認受性，導致政治上出現合法性的危機。Coicaud, *Legitimacy and Politics: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and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trans. and ed. by David A. Curt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0-42.

30 清初遺民如王夫之（1619-1692）及黃宗羲等人，多以「天崩地裂」、「天崩地陷」、「天崩地解」等詞來形容易代之巨變，見王夫之，《王船山詩文集》（香港：中華書局，1974），上冊，《薑齋文集》，卷2〈顯考武夷府君行狀〉，頁28；黃宗羲，《明儒學案》，《黃宗羲全集》第8冊，卷60〈東林學案三〉，頁838。從這些用詞，足以反映時代劇變對他們造成的思想衝擊。



「奉天承運」，便是利用天命作為維護其統治合法性的典型例子。<sup>31</sup>惟這種天命觀無疑是一把雙面利刃，在明初龍興之際，自有助宣傳新政權的合法性，但在明末的亂局中，它卻正正成為了否定衰敗政權合法地位的有力理據。明顯地，此時明政府統治地位的合法性，在庶民心目中所受到的挑戰，更遠比在士人心目中為大。<sup>32</sup>

1645年南京城陷落後，降清的明臣忻城伯趙之龍（？-1654）<sup>33</sup>及保國公朱國弼<sup>34</sup>等人，在傳檄南京各地勸諭漢人降清時，便有下面一段說話：

自遼（916-1125）、金（1115-1234）、元（1271-1368）以來，由沙漠入主中國者，雖以有道伐無道，靡不棄好而構衅，問罪以稱兵。曾有以討賊興師以救援，奮義逐我中國不共戴天之賊，報我先帝死不瞑目之仇，雪耻除凶，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有肅清京闕，修治山陵，安先帝地下之英魂，慰臣子域中之哀痛如大清者乎？有護持我累朝陵寢，修復我十廟宗祧，優恤其諸藩，安輯其殘黎，擢用其遺臣，舉行其舊政，恩深義重，義盡仁至如大清者乎？權奸當國，大柄旁落；初遣魏公韓而不奉詞，繼遣陳洪範而不報命，然後興師問罪，猶且頓兵不進，迂回淮泗，以待一介之來，自古王師，未有以禮以仁、雍容揖讓如大清者也。助信祐順，天與人歸，渡大江而風伯效靈，入金陵而天日開朗，千軍萬馬寂無人聲，白叟黃童聚觀朝市，三代之師，于斯見之。靖南覆沒，誰提一旅之師？故主挾歸，彌崇三恪之祀。凡我藩鎮督撫，誰非忠臣，誰非孝子，識天命之有歸，知大事之已去，投誠歸命，保全億萬

31 參見余繼登（1577年進士），《典故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1，頁18；沈德符（1578-1642），《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上冊，卷2〈列朝·更正殿名〉，頁46-47；俞樾（1821-1906），《茶香室續鈔》（合載於《茶香室叢鈔》，北京：中華書局，1995），第2冊，卷8〈奉天承運四字〉，頁643。

32 誠如趙軼峰在研究明末下層社會的家庭倫理實踐時指出，下層社會的倫理價值觀念雖與精英階層同樣受到官方意識形態所影響，但兩者在實踐上卻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尤其「當基本生存條件受到威脅的時候，平凡的人們會為了生存而打破社會規範。這時候庶民往往比知識分子更現實。」參見氏著，《明代的變遷》（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頁156。

33 趙之龍，江南虹縣人，生年不詳，卒於順治十一年（1654），生平事跡，見《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第20冊，卷79〈貳臣傳乙〉，頁6546-6547；趙爾巽（1844-1927）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1977），第32冊，卷248〈趙之龍傳〉，頁9665-9666。

34 朱國弼，夏邑人，生卒年不詳，生平事跡，見錢海岳（1901-1968），《南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6），第14冊，卷118〈朱國弼傳〉，頁5431-5434。

生靈，此仁人志士之所爲，大丈夫以之自決者也，幸早圖之。<sup>35</sup>

這番話明顯屬於政治宣傳，旨在文飾清人的入侵，並欲藉此以消除漢人的抵抗情緒。然而，當中強調的清人「天命有歸」、明室「大勢已去」等說詞，對於明末以來飽經戰亂的人而言，卻多少亦爲解讀時局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既簡單而又不無說服力的論點。<sup>36</sup>而更重要的是，這種觀點也可讓選擇降清的漢人，在固有的傳統文化中，爲自己違反「忠君」意識形態的行爲找到一個理論依據，從而舒緩個人因屈從於現實所導致的焦慮和愧疚感。<sup>37</sup>況且，對於絕大多數的故明大臣來說，投降清人總比投靠民變隊伍要少點心理障礙。此蓋由於李自成是首先攻入北京，直接迫死崇禎皇帝的元兇，而相反地，滿洲人乃應吳三桂所請入關，多少還晃著爲明主復仇的旗號。例如，降清明臣宋權（1598-1652）就曾說：

我封疆臣，國亡無所屬，復故主讐者，即吾主也。<sup>38</sup>

魏琯（1637年進士）降清後，亦有相類的言論。他在得悉李自成為清兵所敗後，也說：

今（清）皇上爲前朝之君父雪憤，凡有血氣，有不尊親者哉！<sup>39</sup>

按照這種邏輯，投效入關的滿洲政權，以借其力報君父之仇，只不過是仿倣

35 李天根，《燭火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下冊，卷10，頁477-478。

36 姜勝利在探討清初的明史研究時指出，不論是官修或私修明史，在解釋明亡的問題上，多受「天命厭明」、「運祚傾移」等觀念影響。參見氏著，《清人明史學探研》（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頁68-72。

37 降清明臣因個人的政治抉擇而面對道德焦慮（moral anxiety）是不難理解的。從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的角度看，當人們遇到一些令人感到焦慮的事情時，自我（ego）便會利用一些心理策略來舒緩內心的緊張。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稱之爲「自我防衛機制」（ego defense mechanisms），它們包括了「投射」（projection）和「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等做法，即把問題歸咎於別人，或以一種自我能接受，超我（super-ego）能寬恕的理由來文飾自己的行爲等等。有關防衛機制的論述，參看 Anna Freud (1895-1982), *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ce*, trans. by Cecil Baine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46)。

38 湯斌（1627-1687），〈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贈少保兼太子太保文康宋公權神道碑銘〉，載錢儀吉（1783-1850），《碑傳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第1冊，卷7〈明臣宰輔〉，頁127。

3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6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魏琯爲自成等犧牲事啓本〉（順治二年八月初四日），頁141。

申包胥「義哭秦庭」的做法而已。<sup>40</sup>

持平而論，在危難當中，每個人要兼顧的問題很多時候都是多方面的。此間，除了個人的榮辱安危之外，家人和所屬群體的利益亦往往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sup>41</sup>好像當時被譽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降臣龔鼎孳（1616-1673），<sup>42</sup>在他降清之後，每逢與人談到自己的政治抉擇時，便會說：「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sup>43</sup>這是否托詞，現在已無從稽考，但對於不少亡國的明朝臣子來說，家人的安危和生活，卻確實是促使他們決定「苟活」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尤其在亂世忠、孝無法並存的兩難局面下，他們幾經內心掙扎後，最終還是選擇了「存孝」。<sup>44</sup>其實，把「存孝」放在「盡忠」之上者，也並非全無道德理據支持。黃宗羲在其《明夷待訪錄》中，嘗對「君、臣」和「父、子」兩種關係作過這樣的比較：

或曰：臣不與子並稱乎？曰：非也。父子一氣，子分父之身而為身。……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夫然，謂之臣，其名累變。父子固不可變者也。<sup>45</sup>

40 史載，春秋時，吳國攻楚國，入郢，楚國大夫申包胥入秦乞師，依庭牆哭七日，秦乃派兵解其國難。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下冊，卷54「定公四年」，頁2137。

41 Frederic Wakeman, *The Great Enterprise*, pp. 595-598, p. 604. 江南地區的抗清情況正好說明了這點，參見 Frederic Wakeman, "Localism and Loyalism during the Ch'ing Conquest of Kiangnan: The Tragedy of Chiang-yin," pp. 43-85; Hilary J. Beattie, "The Alternative to Resistance: The Case of T'ung-ch'eng, Anhwei," pp. 239-276.

42 顧有孝（1619-1689）與趙溪（？-1676）以錢謙益（1582-1664）、吳偉業（1609-1672）及龔鼎孳為「江左三大家」，並編有《江左三大家詩鈔》（《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3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43 計六奇，《明季北略》下冊，卷22〈幸免諸臣·龔鼎孳〉，頁631。龔鼎孳，崇禎七年（1634）進士，生平資料見《清史列傳》第20冊，卷79〈貳臣傳乙〉，頁6593-6595；又參考何修齡，〈龔鼎孳〉，載何修齡、張捷夫主編，《清代人物傳稿》上編第4卷（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240-246。龔氏所指小妾乃明末名妓顧媚（1619-1664）。顧氏生平，見孟森（1868-1938），〈橫波夫人考〉，載《明清史論著集刊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128-161。

44 計六奇，《明季北略》下冊，卷22〈從逆諸臣〉，頁605、609-614、617-618。

45 《黃宗羲全集》第1冊，頁5-6。司徒琳認為，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提出的，主要都是繼承和綜合了明萬曆以來要求政治改革者的觀點。Struve, "Huang Zongxi in Context: A Reappraisal of His Major Writing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7.3(1988.8): 475-479。如果

除了「存孝」之外，那些在以鄉里利益作首要考慮而降清的地方個案，就更是不可勝數了。<sup>46</sup>有近人的研究更指出，清初漢族士子對出處的安排，很多時候並非單純是個人的取捨，而是在考慮到家族整體利益下的決定。有趣的現象是，在同一個家庭中，成員或出或處，兩者竟可以同時並存，而他們之間，亦存在著極為微妙的關係。而且，越來越多的資料也顯示，部分遺民之可以完節以終，實有賴家族其他成員的出仕，為他們提供了堅拒不出的經濟和政治條件。<sup>47</sup>

大抵而言，明臣降清的背景往往是極為複雜的，而各人的動機亦難以一概而論。也許，大部分人投降的真正原因，將永遠無法說得清楚，但無論如何，「順從天命」、「保全萬民」，卻仍是明降臣為自己變節行為辯護時，較易取得當時輿論同情的解釋。蓋因此等解釋，皆不難從先秦儒家所強調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sup>48</sup>「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sup>49</sup>等「民本思想」中，找到理論的依據。此外，在延續華夏文化的前提下，士人於易代之際改仕新朝，亦可以自視為一種效法元代漢人出仕蒙古，冀望「以夏變夷」，為保存中國文化而忍辱負重的做法。<sup>50</sup>

#### 四、清初社會對明降臣之評價

乾隆朝（1736-1796）以來，持泛道德論者，多對身事二姓的清初明降臣大張撻伐，認為他們大節有虧。<sup>51</sup>清政府為加強忠君教育，亦開始貶斥易代

---

我們接納司徒琳這個論點，則大抵在明末，「移孝作忠」的官方意識形態已受到部分人的質疑，故當時降清者不論是否服膺於黃氏所說的這種政治主張，仍不難以此作為他們「存孝」的理論依據。

46 Frederic Wakeman,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pp. 415-436.

47 黃毓棟對魏禧（1624-1681）及魏氏家族成員在清初出處的研究，為說明這方面的問題，提供了一個極具參考價值的案例。參見氏著，〈明遺民家庭對出處的安排——寧都魏氏個案研究〉，《漢學研究》22.2(2004.12): 387-419。

48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上冊，卷11〈周書·泰誓中〉，頁181。

49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下冊，卷14上〈盡心章句下〉，頁2774。

50 John Langlois, "Chinese Culturalism and the Yüan Analogy: Seventeenth-Century Perspectiv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0 (1980): 355-398.

51 持這種觀點而最著者，當推全祖望（1705-1755）。全氏在表章南明忠臣的同時，亦不忘

之際降清的前明官員。<sup>52</sup>然而，若據此而把所有降清者全都視為不得人心的自私無恥之徒，則未免有欠公允，況且這也並不合乎實情。考諸史實，部分在亂局中，甘冒大不韙而選擇出仕新主的故明舊臣，心中亦存有拯救黎民於水火的抱負。清初藝術家周亮工（1612-1672）和明遺民黃宗羲筆下的丘俊孫（1606-1686），便是這方面的兩個頗為典型的例子。根據當時人所記載：

（周亮工）崇禎庚辰（1640）進士，守土有能聲，而以福建全城功為大。時國朝（清）閩嶠甫定，山海奧壤猶多伏戎，大帥慮泉州十四寨居民從逆，將帥師夷其地。亮工時官布政，爭之力，且以其家百口保無他。帥感其言直，從之。閩人為建報恩祠，刻石射鳥、詩話二樓，以紀活命事。……<sup>53</sup>  
及（亮工）被劾還質，質竟傳逮復入都，百姓皆扶老攜幼，頂香迎道左，爭奉酒食，勸盡觴，號哭聲竟數百里。<sup>54</sup>

至於丘俊孫的個案，黃宗羲寫道：

……（丘俊孫）登崇禎癸未（1643）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督四鎮餉務，旋撫六合。王（清）師下江南，六合羊壁之怨，將屠之。公不得已，為其民請命，單騎入城，導父老以壺漿，全生靈十萬餘戶。遂奉命權稅潞墅，司冊後湖，入為刑部郎中。仁風篤烈，平反大獄數十條，大吏之喜怒不能動搖，……。<sup>55</sup>

---

指責那些「負君棄國」的人。在絕對忠君的前提下，他甚至批評黃宗羲「豈有艱貞蒙難之身，而存一待之見於胸中」。參見全祖望，《鮑琦亭集外篇》（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中冊，卷33〈書毛檢討忠臣不死節辨後〉，頁1431-1432；《鮑琦亭集》（《全祖望集彙校集注》本），上冊，卷22〈黃史肖堂墓版文〉，頁399。

52 清高宗於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三日（1777年1月11日），「命國史館編列明季《貳臣傳》，並對這些所謂「貳臣」大加撻伐。參看慶桂等，《高宗純皇帝實錄》（《清實錄》第21冊），卷1022「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十二月庚子」條，頁693。並參見拙作Wing-ming Chan,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and Ideological Indoctrination in High Qing: Emperor Qianlong's Compilation of the *Erchen Zhuan* and *Nichen Zhuan*," *Oriens Extremus* 44 (2003.4): 253-274.

53 魯曾煜（1721進士），〈周樂園先生傳〉，載錢儀吉，《碑傳集》第1冊，卷10〈明臣部院大臣〉，頁237。

54 姜宸英（1628-1699），〈江南糧儲參議道前戶部侍郎樂園周公墓誌銘〉，載錢儀吉，《碑傳集》第1冊，卷10〈明臣部院大臣〉，頁240。誠然，周亮工仕清並不表示他已無「故國之思」，只是他對儒家入世政治理想的追求，多於他對故國的緬懷，參見平志軍，〈論「貳臣」作家周亮工的「仕清」心態〉，《語文學刊》（高教版）2006.11(2006.11): 40-41。

55 黃宗羲，〈山西右參政籲之丘公墓碑〉，《黃宗羲全集》第10冊，〈碑誌類〉，頁253。



再者，即如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sup>56</sup>由乾隆皇帝敕令編修的《貳臣傳》，<sup>57</sup>書中所錄的125名「貳臣」中，亦不乏循名責實之輩。例如宋權、王弘祚（1603-1674）和衛周胤（？-1660）諸人，他們在恢復地方經濟和秩序方面均頗有政聲。<sup>58</sup>此外，又如言官趙開心（？-1664），更以「清廉剛正」見稱。他在出仕清室期間，曾多次因上言批評清政府的薙髮令和逃人法等弊政而受到貶斥，而死後亦因「家無餘貲」，須「由在朝故知，各致奠賻，才得以克葬」。<sup>59</sup>即使是在嚴格的儒家道德標準下，這些人在匡時濟世方面的貢獻，仍不能一概予以否定，而在同時代的人眼中，他們的行徑也頗有值得推許和稱道之處。

無疑，對於那些出身享有崇高聲譽家族的士人來說，由於社會對他們在操守上的期望往往遠比其他人為高，故他們背棄明室，自然會比一般人

56 乾隆四十一年，西曆為1776年2月19日至1777年2月7日。修《貳臣傳》的上諭發於該年的十二月三日，時為西曆1777年1月11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第8冊，頁479-480，編號1224條；慶桂等，《高宗純皇帝實錄》（《清實錄》第21冊），卷1022「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十二月庚子」條，頁693。

57 現時尚存的《貳臣傳》檔案計有《清史貳臣傳甲編》20冊、《清史貳臣傳乙編》37冊、《欽定國史貳臣表傳》6冊、《清史逆臣傳》7冊、《欽定國史逆臣傳》2冊，以及欽定國史貳逆臣傳目錄，1冊，應屬定本，均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國史館全宗（宗號11）內之傳記主要為嘉慶以後所修，而其中貳臣傳稿甚少，惟「傳129」案卷內有清初大臣洪承疇（1593-1665）、孫承澤（1593-1676）及陳名夏（1601-1654）三人的傳記殘稿，「傳381」內有吳偉業，而「傳389」有曹溶（1613-1685），前三者的傳稿，似為乾隆時檔冊，一檔館誤作嘉慶至光緒時期編。國史館的資料其後流出宮外，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現藏有朱絲欄清鈔本《貳臣傳》六卷10冊，後來的《清史列傳》及《滿漢名臣傳》亦收錄了這些資料。考通行本的貳臣傳記，合計有正傳120附傳5；逆臣的傳記，正傳24，附傳18。有關《貳臣傳》的編修，參看神田信夫，〈清朝の国史列傳と貳臣傳〉，《東方學會創立二十五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東京：東方學會，1972），頁272-291；李新達，〈乾隆帝與貳臣傳〉，《中國史研究》1988.4（1988.11）：163-168；拙作 Wing-ming Chan,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and Ideological Indoctrination in High Qing: Emperor Qianlong's Compilation of the *Erchen Zhuan* and *Nichen Zhuan*."

58 徐作肅（1616-1684），〈太子太保國史院大學士贈少保諡文康宋公墓誌銘〉，載錢儀吉，《碑傳集》第1冊，卷7〈明臣宰輔〉，頁132；趙爾巽等，《清史稿》第33冊，卷263〈王弘祚傳〉，頁9901-9903；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欽定國史貳臣表傳》〈衛周胤〉、《清史貳臣傳乙編》〈衛周胤〉。

59 金成基，〈趙開心〉，載王思治主編，《清代人物傳稿》上編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118-122。



面對較多的社會壓力。<sup>60</sup>例如明代忠良魏大中（1575-1625）的次子魏學濂（1608-？），他在1644年投降李自成便受到士林嚴厲的指責。然而，稍稍披閱時人的記述則不難發覺，當明、清交替之際，不少人在臣節問題上的討論，都會持一種比較務實的態度，頗能體諒當事人所身處的困局，而臧否同代人物時也比較寬厚。邵廷采（1648-1711）在1697年替友人陳執齋（？-1695）寫墓表時，即嘗謂：

於乎，出處之際，難矣！士不幸遭革命之運，迫於事會，不獲守其初服，惟有愛民循職，苟以免清議。若沒沒貴富，入而不返，更數十年面目俱易，則君子羞之。明亡，適荒之盛，超軼前代。如方密之（以智，1611-1671），熊魚山（開元，1599-1676）諸君子，皆托於浮屠；至於章格菴（正宸，1631進士）之徒，既逃其跡，旋掩其名，下逮繩纆牖，抱遺經不試，窮老無悶者，所在多有。而老親在堂，門戶爲重，遭俗蜩沸，寇攘肆橫，不得已紆節以應新朝遘辟。洎乎服官臨政，和平愷悌，使遺黎得蒙更生之澤，當塗見儒者之功。因時順流，爲福匪細。詎謂金仁山（履祥，1232-1303）、謝皋羽（翱，1249-1295）外，遂無正人端士聲流於後哉？<sup>61</sup>

此番言論，無疑是對那些雖「身事兩朝」，但在事功上卻有建樹者的肯定。這正有別於後來昇平盛世，批評者只知從理論層面去議論人臣操守，很多時候都會忽視了複雜的歷史環境，以致出現了過分簡化地採用「死節」和「失節」等二分法來褒貶古人的情況。

若將順治（1644-1661）和康熙（1662-1723）時期的論點和後來的加以比較，可以清楚地看到，由清初到清中葉，整個社會對易代時期人物的評價，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日趨嚴苛。大抵而言，乾隆中葉以後的嚴厲貶斥貳臣觀點，在順、康時期並不流行，相反地，清初輿論在議事論人的時候，事功和社會實效等考慮，往往要較道德空言來得更爲重要。黃宗羲對易代期間，漢人在紓解民困前提下與新政權合作的認可，正可以用來說明此點。黃氏本著「以天下爲事」的態度，其臧否人物，取捨的標準便主要是當事人能

60 有關考證，參見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頁175-228。

61 邵廷采，《思復堂文集》（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51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卷10〈陳執齋先生墓表〉，頁514。執齋爲陳氏字號，其本名不詳。

否爲生民立命，而不在區區所謂「苦節」。除了我們前面提到，他稱許丘俊孫以計使六合避過兵災，「全活十萬人」一例之外，在他的文集中，尚有不少其他的例子。如康熙八年（1669），他替明遺民王仲擢（1599-1667）寫墓表時，不但沒有責難王氏在清兵圍困高唐的時候，私自向敵人納幣議和，反而讚賞他智解高唐之圍，免除了老百姓受「屠戮流離之苦」。<sup>62</sup>此外，又如朱嘉徵（1602-1684），他本爲崇禎十六年（1643）的進士，甲申後任職新朝，「在官六年」方歸故里著書立說，黃宗羲對朱氏的「失身」非但沒有任何微言，反而盛讚他外任四川時的善政。<sup>63</sup>至於對於入清後才應舉出仕的漢人，若有良好政績者，黃氏亦會不避嫌疑而大書其事。如順治乙未（1655）進士陸求可（1617-1679）以循名責實，在地方上有德政、<sup>64</sup>康熙丁未（1667）進士袁時中（1630-1684）曾參與平定「三藩之亂」（1673-1682），<sup>65</sup>兩人均受到黃氏的推許。其實，類似黃氏的觀點並不罕見，有關的例子亦不時散見於清初在野或在朝文士爲明降臣所寫的傳記中。如藏書家黃虞稷（1629-1691）爲周亮工寫行狀，便用了很大的篇幅，分別記載了周氏在明、清兩朝的事功，並由此得出了下面近乎誇張的結論：

嗚呼先生（周亮工）豐功偉績，文采風流，彪炳中外，爲宇內所欽式、士林所依歸者數十年。迹其生平大略，其吏事精能，撫戢殘暴則如張乖崖（詠，946-1015）；其屢更掣錯，乃別利器則如虞升卿（詡，？-137）；其文章名世，領袖後進則如歐陽永叔（修，1007-1072）；其博學多聞，窮搜遠覽則如張茂先（華，232-300）；其風流弘長，座客恒滿則如孔北海（融，153-208）；其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則如陶淵明（365-427）；其敦篤友朋，信心不欺則如朱文季（穆，100-163）；其孺慕終身，友愛無間則如荀景倩（顗，？-274）、李孟元。至其登朝未久，試用不盡則如范希文（仲淹，989-1052）；而遭讒被謗，坎壈挫折又如蘇長公（軾，1037-1101）。<sup>66</sup>

似乎，周亮工的所謂「氣節」問題，並沒有絲毫動搖到黃虞稷對他的崇敬之

62 黃宗羲，〈王仲擢墓表〉，《黃宗羲全集》第10冊，〈碑誌類〉，頁258-259。

63 同上註，〈朱止溪先生墓誌銘〉，頁412-413。

64 同上註，〈參議密庵陸公墓碑〉，頁255-257。

65 同上註，〈提學僉事來菴袁公墓誌銘〉，頁435-436。

66 黃虞稷，〈櫟下先生行狀〉，載錢仲聯（1908-2003）主編，《廣清碑傳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卷3，頁155。

心。此外，在清初漢官之間，亦不一定都把這班前明降臣的過去，視為需要予以迴避的敏感話題。例如魏象樞（1617-1687）為馮如京（1602-1669）寫傳時，便毫無忌諱地提到：

（馮如京）甫弱冠，以諸生高第，餼於廩。崇禎初，詔郡國選士，公褒然為三晉舉首。然數奇，善病，屢躓秋闈。……迨庚辰（1640），大舉海內經明行修之儒，……乃赴廷對，多關切時政語。除知灤州，如捫積猾，復流亡，驛不累民，蝗不為災，種種諸異政，州人歌詠焉。三載遷永平郡丞，無何，甲申（1644），流寇陷明都，賊徒擾亂三輔。公不得已避地山中。……（清）師入關聞公名，檄還郡署，尋擢守永平。是秋，東迎世祖皇帝（愛新覺羅·福臨，1638-1661，1643-1661在位）駕，道經盧龍、令支間，多崎嶇，不可行，公乃跨灤水為梁數十，又民不知勞，乘輿甚安之，賚賜慰勞渥至。閱明年丙戌（1646），擢按察副使。戊子（1648），晉大參，歷陝西榆林、西寧、浙江金衢諸道，江右布政使，覃恩誥授通奉大夫，追贈兩代祖考，皆如其官。……以廣東左布政使致仕。<sup>67</sup>

清初明遺民與「貳臣」之間的交往，亦一再印證了這點：明、清易代時期，知識階層對降清者並非一味排拒，而議事論人很多時候也會採取一種較具彈性的寬容態度。故明降臣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和曹溶（1613-1685）等人在入清後的交遊事跡，都是這方面的有力證據。錢謙益為明末東林巨擘，文壇領袖，以博學見著於當世，惟於乙酉清兵圍攻南京時，他卻率先投降，<sup>68</sup>故其晚節多為後人所訾議。<sup>69</sup>然而，他在辭去清朝官職後，復又暗中通款永曆（1647-1662）小朝廷，秘密參與南明抗清活動，<sup>70</sup>並曾因為江陰貢生

67 魏象樞，《寒松堂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8〈方伯馮秋水先生傳〉，頁414。

68 巴泰等，《世祖章皇帝實錄》（《清實錄》第3冊），卷17「順治二年五月己酉」條，頁148；顧苓（1609-1682以後），〈東澗遺老錢公別傳〉，載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卷1，頁4-5；金鶴沖（1873-1960），〈錢牧齋先生年譜〉，見錢謙益著，錢仲聯編校，《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8冊，頁930-952。

69 赫治清，〈錢謙益〉，見何修齡、張捷夫主編，《清代人物傳稿》上編第6卷（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210-224。

70 現存有關錢氏牽涉反清活動的資料十分有限，惟據近人陳寅恪（1890-1969）的考證，錢氏確曾參與其事。參見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下冊，〈復明運動（附錢氏家難）〉，頁882-1197。

黃毓祺（？-1649）的謀反案而受到牽連，被捕入獄。<sup>71</sup>錢氏對故明和清室的曖昧態度，以及他的個人操守，至今仍是頗具爭議的歷史課題。<sup>72</sup>不過，他在有生之年，似乎並未因晚節上的污點而受到士林的排斥。<sup>73</sup>相反，即如以明遺民自況的黃宗羲和歸莊（1613-1673）諸人，入清後仍與他保持著相當深厚的交誼。<sup>74</sup>可以說，錢氏的名聲，在其身後之所以江河日下，實為乾隆中葉以來官方刻意打壓的結果。清高宗自乾隆二十六年（1761）開始，先後多次公開譴責錢謙益，<sup>75</sup>並明令在全國徹底查禁他的作品，<sup>76</sup>又復於乾隆四十一年特命

71 巴泰等，《世祖章皇帝實錄》（《清實錄》第3冊），卷38「順治五年四月辛卯」條，頁307。黃毓祺謀反案，詳見祝純嘏，《孤忠後錄》，載《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三朝野記》（原《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上海：上海書店，1982），頁223-232。黃氏生平，參見徐秉義（1633-1711），《明末忠烈紀實》（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卷16，頁326；溫睿臨，《南疆逸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36，頁257-258；高宇泰，《雪交亭正氣錄》（《臺灣文獻叢刊》第286種，臺北：臺灣銀行，1970），卷4，頁105。陳寅恪據洪承疇揭帖，謂錢氏繫獄當如其所自述，在順治四年（1647），而非官書所說的順治五年（1648），見《柳如是別傳》，頁882-895。或謂，錢氏於順治四年和五年，實曾兩度遭清人逮捕，見裴世俊，《四海宗盟五十年——錢謙益傳》（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頁159-167。

72 不少學者均認為錢氏的降清，乃醉心於功名利祿所致（如赫治清，〈錢謙益〉，頁210），然而，美國學者魏斐德則認為，錢氏投降，乃出於保護朋友和保存人材等考慮。見Wakeman, *The Great Enterprise*, pp. 595-596.

73 魏斐德嘗謂，錢謙益在投降清朝後即臭名昭著（見Wakeman, *The Great Enterprise*, p. 718），這點似乎並不真確。據謝正光的考證，就現存清初詩文中所見，時人對錢氏失身事清，亦不乏同情諒解者，而貶斥錢氏之言，乃於康熙以後才逐漸成為社會上的共識，並於乾隆時變成定讞。參見謝正光，〈探論清初詩文對錢謙益評價之轉變〉，原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1(1990): 261-281，後收入氏著，《清初詩文與士人交游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60-108。亦參考陳望南，〈文學接受進程中的錢牧齋〉，《中山大學學報》2003.6(2003.11): 7-13及121。

74 黃宗羲，《思舊錄》，《黃宗羲全集》第1冊，頁374-375；歸莊，《歸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卷8〈祭錢牧齋先生文〉，頁470-472。

75 慶桂等，《高宗純皇帝實錄》（《清實錄》第17冊），卷648「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十一月庚子」條，頁251；第19冊，卷836「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六月丙辰」條，頁155-156；第21冊，卷996「乾隆四十年乙未十一月癸未」條，頁316-31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第3冊，頁764-765，編號2149；第5冊，頁794-795，編號2147；第8冊，頁86-87，編號205。

76 慶桂等，《高宗純皇帝實錄》（《清實錄》第19冊），卷837「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六月乙亥」

「國史內另立貳臣傳一門」，貶斥錢氏及其他明降臣。<sup>77</sup>這些措施，使後世每談及錢氏，很容易便會將焦點放在他的「節操」問題上，並且受到官方定論的影響，把他看成是一個歷史上的「反派」人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觸怒這位自命為「歷史判官」<sup>78</sup>的滿洲天子，促使他要全面封殺同情錢氏輿論的原因，正正由於他在無意之中發現，這個在他眼中屬於「有才無行」、「大節有虧」的小人，在其身故之後，經過了近百年的時間，竟然仍在沈德潛（1673-1769）等漢族精英心目中，享有極為崇高的地位，甚至被他們推許為清代「開代詩人之首」。<sup>79</sup>

吳偉業是錢謙益以外，經常為人所提及的清初貳臣。他是明末清初的著名詩人和劇作家，崇禎四年（1631）一甲進士，歷任東宮講讀官、南京國子監司業等職位，南明時曾出任少詹事，後見事不可為而辭官歸隱。順治十年（1653），吳氏因受聲名所累，逼於徵召而出仕新朝，官至國子監祭酒。<sup>80</sup>三年後，他以奉嗣母之喪為由辭官還鄉，並對自己有負先帝的失節行為深感悔

---

條，頁179-180；卷841「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八月戊寅」條，頁238-240；第21冊，卷1021「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十一月甲申」條，頁683-685；卷1022「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十二月戊戌」條，頁693；第22冊，卷1075「乾隆四十四年己亥正月甲寅」條，頁434-435；卷1095「乾隆四十四年己亥十一月甲辰」條，頁68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第5冊，頁822，編號2183；頁877，編號2353；第8冊，頁468-469，編號1198；頁479，編號1223；第9冊，頁449-450，編號1284-1285；頁882，編號2149。有關研究，參考莊吉發，〈清高宗禁燬錢謙益著述考〉，《大陸雜誌》7.5(1973.11): 22-30。

77 慶桂等，《高宗純皇帝實錄》（《清實錄》第21冊），卷1022「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十二月庚子」條，頁693-694；第22冊，卷1051「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二月乙卯」條，頁50；第23冊，卷1142「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十月癸酉」條，頁293-294；第25冊，卷1232「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六月庚申」條，頁293-29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第8冊，頁479-480，編號1224；頁934-935，編號2480；第10冊，頁805，編號2154；第14冊，頁967-968，編號2283。

78 何冠彪，〈論清高宗自我吹噓的歷史判官形象〉，氏著，《明清人物與著述》（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6），頁146-182。

79 慶桂等，《高宗純皇帝實錄》（《清實錄》第17冊），卷648「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十一月庚子」條，頁25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第3冊，頁764-765。

80 吳氏生平，參見馮其庸、葉君遠，《吳梅村年譜》（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葉君遠，《吳偉業評傳》（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恨。<sup>81</sup>吳氏曾經是復社成員，<sup>82</sup>少年得志，在文壇又頗負盛名，故其變節，亦少不免受人譏諷。<sup>83</sup>然而，綜觀他的晚年社交，一班遺民朋友似乎對其被逼仕清的經歷，仍持相當同情的態度。例如，顧湄<sup>84</sup>在吳偉業身後替他寫傳時，便特意地指出，甲申之變，吳氏本欲自縊殉國，惟遭母親極力阻止而未果。<sup>85</sup>弦外之音，在於凸顯傳主不幸遭逢世變，而又身不由己的困境。遺民史家談遷在順治十至十三年（1653-1656）旅居北京，其間正值吳偉業奉召至京，兩人因切磋勝朝史事而過從甚密。<sup>86</sup>政治取向上的不同，並無損他們的友情，而吳氏的仕清行為，看來也沒有減低談遷等遺民對他的推崇和尊敬。明遺民杜濬（1611-1687）對吳氏的態度亦可以證明這一點。杜氏在他對吳偉業的祭文中亦提到：

濬之別先生（吳偉業）也，歲在己亥（1658），其時先生以北祭酒歸甫彌年，而濬之自廢則自乙酉（1645）矣。師生之誼，至是相視默然。……嗟呼！先生不可忘；己亥之別，尤不可忘也。自是以來，無歲不思再訪五畝之園，與先生極論曩昔，而先生遂歿耶！嗚呼痛哉！<sup>87</sup>

81 有學者認為，吳偉業對自己仕清行為的追悔，除了有愧於「失節」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自覺有負崇禎帝的一番栽培。見施寶男，〈從吳偉業隱居十年的作品看其仕清政治態度〉，《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2.3(2007.3): 30-33。程華平亦謂，吳偉業「對崇禎皇帝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引以為榮」，「銘刻在心，終其身不忘」。見程華平，《明清傳奇編年史稿》（濟南：齊魯書社，2008），頁212。

82 吳偉業對其參與復社活動之自述，見氏著，〈復社紀事〉（載《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東林始末》，上海：上海書店，1982，頁157-164及《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中冊，卷24〈文集二〉，頁599-607）。

83 錢泳（1759-1844），《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21〈笑柄·太無賴〉，頁547。

84 顧湄，本姓程，字伊人，明遺民，生卒年不詳，活躍於順治年間，遺世有《違竿集》二卷及由吳偉業所選編的《水鄉集》一卷（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第2冊，頁1777）。顧氏生平，見《清史列傳》第18冊，卷70〈文苑傳一·顧湄〉，頁5743-5744。

85 顧湄，〈吳梅村先生行狀〉，載吳偉業，《吳梅村全集》下冊，〈附錄一·傳記、祭文〉，頁1404。

86 談遷，《北游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紀文〉，頁269-271；並參見同書，〈紀郵上〉，頁45-89；〈紀郵下〉，頁91-131；張宗原，〈談遷和吳偉業〉，《華東理工大學學報》1994.2-3: 59-62。

87 杜濬，〈祭少詹吳公〉，載《吳梅村全集》下冊，〈附錄一〉，頁1421。



崇敬之情，洋溢於字間。

至於龔鼎孳和曹溶兩人在清初與明遺民的交誼，以及他們如何運用在朝的影響力，保護了不少拒與新朝合作的士子，這方面的問題，近人已論之甚詳，<sup>88</sup>此處不復贅言。事實上，除了政治庇護之外，部分遺民由於生計無著，在經濟上很多時也需要依賴那些已出仕清政府的朋友予以接濟。<sup>89</sup>必須指出的是，要是該時社會對降清者缺乏一種諒解和寬容的態度，根本就不可能出現這種由兩批政治取向互異者所組成的社交圈子，而前面提到，明遺民對他們降清友儕的推許，亦會變得令人費解。

大抵而言，不論是降清明臣的實際社交生活，或時人對他們的描述和評價，均反映了在順治和康熙年間，社會輿論並未因為這班前朝舊臣背離「忠君」的大原則，而完全抹煞他們於仕清後在政經或文化方面的貢獻。當然，在「忠君」的主導意識形態下，「身仕兩朝」者固難免為當時的道德主義者所冷譏熱嘲，<sup>90</sup>而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他們不光彩的變節往跡，亦很容易成為政敵攻擊的把柄。史載，順治二年八月丙申（1645年10月6日），龔鼎孳與馮銓（1595-1672）廷爭，其間龔氏便因為自己先前曾經投降李自成而受到

88 何齡修，〈龔鼎孳〉，《清代人物傳稿》上編第4卷，頁240-246；裴世俊，〈清初「江左三大家」降臣詩群探論〉，《蘇州大學學報》2003.2(2003.4): 19-53及136；馬大勇，〈龔鼎孳與清初詞壇的風雲際會〉，《西北師大學報》37.6(2000.11): 53-57；〈清初京師詩界職志龔鼎孳論〉，《中國韻文學刊》2002.1(2002.6): 36-42；楊潤平，〈傅山與魏象樞的交往〉，《張家口職業技術學院學報》14.4(2001.11): 11-14；謝正光，〈清初貳臣曹溶及其「遺民門客」〉，氏著，《清初詩文與士人交游考》，頁222-300；李勝華，〈王士禛與明遺民交游事迹考論〉，《瀋陽師範大學學報》2004.6(2004.11): 81-85；王星慧，〈康熙二年顧炎武在山西與曹溶、李因篤的交遊——兼論顧亭林的交遊思想〉，《雁北師範學院學報》22.4(2006.8): 35-38；李瑄，〈明遺民與仕清漢官之交往〉，《漢學研究》26.3(2008.6): 131-162。

89 傅山便是其中一個較為著名的例子。有關的敘述，參考Qianshen Bai, *Fu Shan's Wor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pp. 87-97. 此外，部分遺民如談遷、查繼佐（1601-1676）、陸世儀（1611-1672）等人，亦迫於生計，先後游幕於清初漢官的幕府之中。參見尙小明，〈清代士人游幕表〉（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42-43。

90 劉獻廷（1648-1695），《廣陽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57），卷1，頁10；王應奎（1683-1759或1760，一作1684-1757），《柳南續筆》（合載於《柳南隨筆·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2〈諸生就試〉，頁165；卷4〈正錢錄〉，頁209-210；龔煒（1704-？），《巢林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3〈錢謙益與龔鼎孳〉，頁76。

攝政王多爾袞（1612-1650）的訓斥：

（馮銓：）「流賊李自成，將我故主崇禎陷害，竊取神器，（龔）鼎孳何反順陷害君父之李賊？竟為北城御史！」王（多爾袞）曰：「此言實否？」鼎孳曰：「實。豈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歸順？魏徵（580-643）亦曾歸順唐太宗（李世民，599-649，626-649在位）！」王笑曰：「人果自立忠貞，然後可以責人。已身不正，何以責人？鼎孳自比魏徵，以李賊比唐太宗，殊為可恥。似此等人，何得侈口論人？但縮頸靜坐，以免人言可也。」<sup>91</sup>

在定鼎之初，清政府基於戰略考慮，為了拉攏故明舊臣而對他們的變節行為多未加非難，但其對降臣的輕蔑，仍可從上述的例子中窺見一斑。至於在一眾降臣之中，不少人或多或少都帶有一種對前朝的疚負感，這也是不爭的事實。<sup>92</sup>然而，若單憑此方面的例子，便誤以為清初朝野對明降臣的評價，與乾隆以後對「貳臣」的嚴苛指責並無二致，<sup>93</sup>則無疑是把兩種帶有不同時代烙印的話語混為一談，忽略了那些在易代之際飽受戰亂折磨的當事人，與一個半世紀後，身處太平盛世的盛清子民，對於同一問題的認識，已難以同日而語。

## 五、結 論

近年發展迅速的文化研究理論——尤其對「關鍵詞」（keywords）的研究，為我們分析、比較清初（順治、康熙）和乾隆朝社會話語的差異，提供了很有參考價值的觀點。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作為話語實踐（language practice）的產物，社會觀念並非是凝固和恆久不變的，相反地，它與歷史文

91 巴泰等，《世祖章皇帝實錄》（《清實錄》第3冊），卷20「順治二年八月丙申」條，頁177。

92 這方面，洪承疇是個值得注意的例子。趙翼（1727-1814）謂，洪承疇死後，家人為其「撰行狀不復敘前朝事，但自佐命入關起。」按理推斷，這大概是因為洪氏平日諱言前朝舊事，家人在他身後為之寫行狀，亦按其遺意，只述他在入清後的事跡。趙翼，《簞曝雜記》（合刊於《簞曝雜記·竹葉亭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2〈洪經略行狀〉，頁39。

93 現仍有不少學者持這種觀點，如張玉興在討論明清人物的評價時，便認為：「弘曆（清高宗乾隆）對明忠臣即所謂明季殉節者亦即抗清志士與貳臣降清者褒貶態度極其鮮明。……清朝皇帝（乾隆）之思想與其先人努爾哈赤（1559-1626）、皇太極（1592-1643）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是對正義、正氣即中國傳統的高尚道德情操一種呼喚與肯定。」張玉興，〈明清之際反民族壓迫鬥爭中歷史人物的褒善貶惡〉，《清史研究》1998.2(1998.6): 110。

化環境經常保持著一種活躍的互動關係，並會隨著時日推移和歷史條件的改變而在內容上不斷推陳出新。<sup>94</sup> 因此，在考察不同時期的社會話語時，必須把體現於語詞內容變化中的時代觀念，放到其所屬的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裏予以分析，這樣才可以避免把已經轉變了的觀念與原來的混為一談。

考諸史實，明、清之際不單單是一個舊政權解體而新政權尚未取得統一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官方意識形態暫時失卻了主導地位的時期。明末弊政和伴之而來的社會動盪，促使那些身受亡國之痛的有識之士一再反思，並由此引發出批判君主專制的連番激烈言論，諸如「天下為主，君為客」、<sup>95</sup>「有亡國，有亡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sup>96</sup>「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sup>97</sup>等見解，都對「一姓之忠」這種長期習以為常的觀念，提出了強烈的異議。在這種質疑「愚忠」的氣氛和環境下，士人在總結明亡的教訓和反省其社會責任時，「忠君」或許仍是一個重要的德目，但卻已不再如大一統時期一樣，是凌駕於其他道德使命的首要考慮。相對而言，萬民的福祉和漢族文化所繫的「天下」，此時在他們心目中要遠比一姓的興亡來得更為重要。畢竟，南明幾個小朝廷都在內鬥下相繼為清人所滅，明亡已屬非人力所能改變的政治現實，但在紛亂的局面下重建社會秩序、在外族的鐵蹄下延續華夏文化等重要而迫切的工作，卻不能因為個人的政治立場而要求人人坐視不理。<sup>98</sup> 正是這個

---

94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1-26.

95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黃宗羲全集》第1冊，頁2。

96 王夫之，《黃書》（《黃書·噩夢》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帝宰第三〉，頁17。

97 唐甄（1630-1704），《潛書》（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王聞遠刻本影印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第94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下篇·下·室語〉，葉54下（頁454）。

98 清初遺民雖不少退居山林，不問世事，但他們當中，亦有人對於諸如延續華夏文化和保存故國歷史等重要課題甚為關注。除了前面所引Langlois關於清初漢人對在異族統治底下如何延續漢文化的討論外，遺民為官修《明史》提供直接和間接協助，也屬於這方面的例子。參看姜勝利，〈明遺民與清初明史學〉，《安徽大學學報》27.1(2003.1): 9-14。郭英德在討論黃宗羲在南明敗亡後的人生定位時指出，清初明遺民以對待世務的態度而言，可分成四類型，即：混世者、避世者、逃世者和入世者。最後一類入世遺民，並不因其遺民身分而廢當世之務。參見郭英德，〈黃宗羲的人生定位與文化選擇——以清康熙年間為中心〉，載陳平原、王德威、商偉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26。

緣故，當時即使是那些懷有強烈故國之思的明遺民，仍會對與自己政治立場互異，但在改善民生、恢復社會秩序，以及維護華夏文化於不墜等幾方面有實績的清初明降臣，採取了較為寬容的態度，並肯定他們在局勢紛亂的艱難環境下所作出的貢獻。此種講求設身處地考慮問題的論人議事作風，往後自然很難在那些生於天下復歸一統時期，缺乏類似經歷的士人之間引起共鳴。

畢竟，殘酷的改朝換代經歷，使當事人深深體會到在非常的社會環境下，理論和實踐之間所存在的道德張力。例如大儒黃宗羲和顧炎武等人，他們在政治理念上，一向反對將天下視為一家一姓的私產，更加反對把臣子視作君主的家奴，並據此倡議，人臣之義須超乎一姓之忠。然而，他們在對專制政治大加撻伐的同時，晚年卻越重視自己的「臣節」名聲，深恐因節名受損而遭到世俗人的批評和指責；<sup>99</sup>那些一直以明遺民自況的士人，不少人在入清後卻又不忘為子孫謀取功名，為的只是希望保障家族和後人的利益。<sup>100</sup>同樣地，朋友之間經多年而建立起來的交誼和人際網絡，也不可能在改朝換代中，因個人政治取向的分歧而剎那間一刀兩斷。糾纏不清的情感因素，微妙的利益關係，往往使人無法完全抽身，以純粹局外人的身分去評價友儕的抉擇。這種複雜而矛盾的實際生活體驗，遂令他們在批評同時人的時候，會傾向採取一種較為同情的態度。也許，人類歷史本來就充滿了種種弔詭，只是這些不協調的現象，很多時候在主導意識形態支配下的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中，都會遭到有意或無意的省略。<sup>101</sup>

---

99 顧炎武，〈附答李子德諱因篤〉，氏著，《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亭林文集》，卷4，頁75-76。

100 何冠彪，〈論明遺民子弟之出試〉，《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頁125-167。其實，自古以來，這種理論與實踐間的矛盾並不罕見。比如我們熟悉的近代新文化運動時期，當時不少主張把古書丟進茅坑的學者，本身卻醉心於傳統文化的研究；倡議自由戀愛思想家，私底下卻被迫屈服於父母的「包辦婚姻」。參看王德昭（1914-1982），〈論五四運動對文化遺產的繼承〉，載於蕭延中、朱藝編，《啓蒙的價值與局限——臺、港學者論五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頁124-145；周明之，〈從胡適的婚姻看「五·四」思想文化的衝突〉，蕭延中、朱藝編，《啓蒙的價值與局限——臺、港學者論五四》，頁154-182。

101 近年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對「宏大敘事」的批判，對我們探討類似的問題，頗有參考的價值。參看 Jean-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叢刊》（電子版）初編集部，北京：書同文數字化技術公司，2001。
- 宋·朱熹著，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明·《萬曆邸鈔》，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1。
- 明·《萬曆起居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 明·計六奇，《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明·余繼登，《典故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1。
-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明·劉宗周，《劉宗周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 明·錢謙益著，錢仲聯編校，《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明·談遷，《北游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
- 明·談遷，《國權》，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
- 明·黃宗羲著，吳光編，《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 明·歸莊，《歸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明·顧炎武，《原抄本日知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 明·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明·祝純嘏，《孤忠後錄》，《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三朝野記》，上海：上海書店，1982。
- 明·高宇泰，《雪交亭正氣錄》，臺北：臺灣銀行，1970。
- 明·顧有孝，《江左三大家詩鈔》，《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3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明·萬斯同，《石園文集》，《四明叢書》，臺北：國防研究院、中華大典編印會，1966。
- 清·《多爾袞攝政日記》，北平：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1933。
- 清·吳偉業，《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清·吳偉業，《復社紀事》，《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東林始末》，上海：上海書店，1982。

- 清·魏象樞，《寒松堂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
- 清·王夫之，《王船山詩文集》，香港：中華書局，1974。
- 清·王夫之，《黃書·噩夢》，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 清·唐甄，《潛書》，《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第94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王聞遠刻本影印本，1995。
- 清·徐秉義，《明末忠烈紀實》，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57。
- 清·邵廷采，《思復堂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51冊，濟南：齊魯書社，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1997。
-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83。
- 清·龔煒，《巢林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
- 清·全祖望著，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清·溫睿臨，《南疆逸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清·巴泰等，《世祖章皇帝實錄》，《清實錄》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慶桂等，《高宗純皇帝實錄》，《清實錄》第9-27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1986。
- 清·李天根，《燭火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 清·錢泳，《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
-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續鈔》，北京：中華書局，1995。
- 清·趙翼，《簞曝雜記·竹葉亭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清·錢儀吉，《碑傳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1977。
- 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
- 吳晗編，《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80。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6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
- 《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 Martini, Martin. *Bellum Tartaricum, or the Conquest of the Great and Most Renowned Empire of China*. London: John Crook, 1654.



## 二、近人論著

- (日) 小野和子 1996 《明季党社考：東林党と復社》，東京：同朋社。
- 王星慧 2006 〈康熙二年顧炎武在山西與曹溶、李因篤的交遊——兼論顧亭林的交遊思想〉，《雁北師範學院學報》22.4(2006.8): 35-38。
- 王德昭 1989 〈論五四運動對文化遺產的繼承〉，收錄於蕭延中、朱藝編，《啓蒙的價值與局限——臺、港學者論五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頁124-145。
- 平志軍 2006 〈論「貳臣」作家周亮工的「仕清」心態〉，《語文學刊》(高教版) 2006.11(2006.11): 40-41。
- (日) 安部健夫 1971 《清代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
- 何冠彪 1991 〈論明遺民之出處〉，《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頁53-124。
- 何冠彪 1991 〈論明遺民子弟之出試〉，《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頁125-167。
- 何冠彪 1996 〈論清高宗自我吹噓的歷史判官形象〉，《明清人物與著述》，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頁146-182。
- 何冠彪 1997 《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何修齡 1987 〈龔鼎孳〉，收錄於何修齡、張捷夫主編，《清代人物傳稿》上編第4卷，北京：中華書局，頁240-246。
- 余英時 2003 〈道統與政統之間——中國知識分子的原始型態〉，《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77-99。
- 余英時 2003 《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臺北：允晨文化公司。
- 李 文 2000 〈文人風骨〉，《文學自由談》2000.4(2000.8): 4-11。
- 李 文 2007 〈文人的節操〉，《文學自由談》2007.2(2007.4): 4-13。
- 李秉鑒 2006 〈刺貳臣詩撫談〉，《閱讀與寫作》2006.10(2006.10): 29-30。
- 李勝華 2004 〈王士禛與明遺民交游事迹考論〉，《瀋陽師範大學學報》2004.6(2004.11): 81-85。
- 李新達 1988 〈乾隆帝與貳臣傳〉，《中國史研究》1988.4(1988.11): 163-168。
- 李 瑄 2008 〈明遺民與仕清漢官之交往〉，《漢學研究》26.3(2008.6): 131-162。
- 李靈年、楊忠主編 2000 《清人別集總目》，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汪榮祖 2004 〈江南與明亡清興——兼論歷史地緣說〉，收錄於熊月之、熊秉真

- 編，《明清以來江南社會與文化論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頁 1-13。
- 周明之 1989 〈從胡適的婚姻看「五·四」思想文化的衝突〉，收錄於蕭延中、朱藝編，《啓蒙的價值與局限——臺、港學者論五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頁 154-182。
- 孟 森 1986 《明清史論著集刊續編》，北京：中華書局。
- 尚小明 2005 《清代士人游幕表》，北京：中華書局。
- （日）岸本美緒 1999 《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17世紀中国の秩序問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金成基 1984 〈趙開心〉，收錄於王思治主編，《清代人物傳稿》上編第 1 卷，北京：中華書局，頁 118-122。
- 姜勝利 1997 《清人明史學探研》，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 姜勝利 2003 〈明遺民與清初明史學〉，《安徽大學學報》27.1(2003.1): 9-14。
- 施賽男 2007 〈從吳偉業隱居十年的作品看其仕清政治態度〉，《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2.3(2007.3): 30-33。
- （日）神田信夫 1972 〈清朝の国史列傳と貳臣傳〉，《東方學會創立二十五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東京：東方學會，頁 272-291。
- 馬大勇 2000 〈龔鼎孳與清初詞壇的風雲際會〉，《西北師大學報》37.6(2000.11): 53-57。
- 馬大勇 2002 〈清初京師詩界職志龔鼎孳論〉，《中國韻文學刊》2002.1(2002.6): 36-42。
- 張玉興 1998 〈明清之際反民族壓迫鬥爭中歷史人物的褒善貶惡〉，《清史研究》1998.2(1998.6): 102-112。
- 張宗原 1994 〈談遷和吳偉業〉，《華東理工大學學報》1994.2-3: 59-62。
- 張曉虎 1984 〈孫奇逢〉，收錄於王思治主編，《清代人物傳稿》上編第 1 卷，北京：中華書局，頁 176-177。
- 張錫勤、柴文華主編 2008 《中國倫理道德變遷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
- 莊吉發 1973 〈清高宗禁燬錢謙益著述考〉，《大陸雜誌》7.5(1973.11): 22-30。
- 郭厚安 1995 〈論明清之際對君主專制的批判〉，《西北師大學報》32.5(1995.9): 1-8。
- 郭英德 2001 〈黃宗羲的人生定位與文化選擇——以清康熙年間爲中心〉，收錄於陳平原、王德威、商偉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湖

北教育出版社，頁 23-41。

陳乃乾 1959 《清代碑傳文通檢》，北京：中華書局。

陳寅恪 1980 《柳如是別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望南 2003 〈文學接受進程中的錢牧齋〉，《中山大學學報》2003.6(2003.11): 7-13 及 121。

麥穆倫 (Ian McMorran) 著，程薇譯 1996 〈明清鼎革之際忠君考〉，收錄於龍巴爾 (Denys Lombard) 及李學勤編，《法國漢學》第 1 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頁 46-56。

程華平 2008 《明清傳奇編年史稿》，濟南：齊魯書社。

馮天瑜、謝貴安 2003 《解構專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馮其庸、葉君遠 1990 《吳梅村年譜》，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黃一農 2005 《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

黃毓棟 2004 〈明遺民家庭對出處的安排——寧都魏氏個案研究〉，《漢學研究》22.2(2004.12): 387-419。

楊潤平 2001 〈傅山與魏象樞的交往〉，《張家口職業技術學院學報》14.4(2001.11): 11-14。

(日) 溝口雄三 1980 《中國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會。

葉君遠 1999 《吳偉業評傳》，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寧可、蔣福亞 1994 〈中國歷史上的皇權和忠君觀念〉，《歷史研究》1994.2(1994.4): 79-95。

裴世俊 2001 《四海宗盟五十年——錢謙益傳》，北京：東方出版社。

裴世俊 2003 〈清初「江左三大家」降臣詩群探論〉，《蘇州大學學報》2003.2(2003.4): 19-53 及 136。

赫治清 1991 〈錢謙益〉，收錄於何修齡、張捷夫主編，《清代人物傳稿》上編第 6 卷，北京：中華書局，頁 210-224。

趙軼峰 2008 《明代的變遷》，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劉澤華主編 1996 《中國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蕭公權 1980 《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

錢海岳 2006 《南明史》，北京：中華書局。

謝正光 2001 〈探論清初詩文對錢謙益評價之轉變〉，《清初詩文與士人交游考》，

-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頁 60-108。
- 謝正光 2001 〈清初貳臣曹溶及其「遺民門客」〉，《清初詩文與士人交游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頁 222-300。
- 謝國楨 1982 《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北京：中華書局。
- 魏良弢 1994 〈忠節的歷史考察：先秦時期〉，《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1994.1(1994.2): 110-120。
- 魏良弢 1995 〈忠節的歷史考察：秦漢至五代時期〉，《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1995.2(1995.5): 119-130。
- Bai, Qianshen. 2003. *Fu Shan's Wor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Beattie, Hilary J. 1979. "The Alternative to Resistance: The Case of T'ung-ch'eng, Anhwei." In Jonathan D. Spence and John E. Wills, Jr., eds.,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239-276.
- Chan, Wing-ming. 2003.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and Ideological Indoctrination in High Qing: Emperor Qianlong's Compilation of the *Erchen Zhuan* and *Nichen Zhuan*." *Oriens Extremus* 44(2003.4): 253-274.
- Coicaud, Jean-Marc, trans. and ed. by David A. Curtis. 2002. *Legitimacy and Politics: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and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Richard. 1996. *Wind Against the Mountain: The Crisis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 De Bary, William. 1957. "Chinese Despotism and the Confucian Ideal: A Seventeenth-Century View." In John K. Fairbank,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63-203.
- Freud, Anna, trans. by Cecil Baines. 1946. *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c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Ho, Koon-piu. 1994. "Should We Die as Martyrs to the Ming Cause?—Scholar-officials' Views on Martyrdom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Oriens Extremus* 37.2: 123-151.
- Jean-François Lyotard, trans.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1984. *The*

-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Langlois, John. 1980. "Chinese Culturalism and the Yüan Analogy: Seventeenth-Century Perspectiv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0: 355-398.
- Struve, Lynn. 1984. *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truve, Lynn. 1988. "Huang Zongxi in Context: A Reappraisal of His Major Writing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7.3(1988.8): 475-479.
- Struve, Lynn. 1988. "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 In Denis Twitchett and Frederick W. Mote,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7,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641-725.
- Wakeman, Frederic, Jr. 1975. "Localism and Loyalism during the Ch'ing Conquest of Kiangnan: The Tragedy of Chiang-yin." In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 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43-85.
- Wakeman, Frederic, Jr. 1985.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ang, Gung-wu. 1959. "Feng Tao: An Essay on Confucian Loyalty." In Arthur F. Wright, ed., *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88-210.
- Williams, Raymond. 1983.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llaborators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Early Qing

Chan Wing-ming\*

### Abstract

Since the compilation of the *Biographies of Twice-serving Ministers* (貳臣傳 *Erchen Zhuan*) in the Qianlong 乾隆 era, it has been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Qing collaborators were condemned by contemporaries for their betrayal of the Ming dynasty. However, this impression, which was generat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Qianlong ideology, is severely challenged by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Ming-Qing dynastic change was a period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which ideological control was relaxed. Citing comments made by early-Qing literati on the surrendered Ming officials, it argues that the corrupt politics of the late Ming gave rise to criticism of “blind loyalty,” an ideology advocated by the ruling class; the urgent need to restore social order and maintain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early Qing also led to an emphasis on social pragmatism rather than moral idealism in discussions of official matters. As a result, those former Ming officials in Qing office whose deeds contribu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the restoration of social order, or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culture won the public’s sympathy and acknowledgement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Keywords:** adherents, turncoat official, late Ming, early Qing, Qian Qianyi 錢謙益, Wu Weiye 吳偉業

---

\* Chan Wing-ming is a postdoctoral fellow and honorary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Chinese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